



## □ 郑学富

明朝万历年间，京杭大运河改道由夏镇向东经台儿庄南下，名不见经传的荒凉村落台儿庄迎来了发展机遇，借助运河漕运黄金水道的优势，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商贸重镇。清光绪版《峰县志》说：“台儿庄跨漕渠，当南北孔道，商旅所萃，居民饶给，村镇之大，甲于一邑，俗称‘天下第一庄’。”

京杭大运河原先不流经台儿庄，是从济宁沿南阳、独山、昭阳、微山南四湖之西侧，经徐州与黄河交汇，然后借不老河转入邳县，借徐州至淮安一段黄河行运。但黄河时常泛滥，导致漕运常常受阻，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。尤其是徐州、吕梁二洪为河道上的两处急流险滩，成为运河漕运的“鬼门关”，船只经此而过，常出现船覆人亡的事故。据《明史·河渠志》记载，从嘉靖六年(1527年)至万历三年(1575年)，邳县经徐州至济宁运道发生的“黄河害运”事件，达十次之多。

明隆庆三年(1569年)，总河都御史翁大立向朝廷提出开通泇河，以避徐、吕之险。此后30多年，总河尚书舒应龙、总河刘东星、李化龙、曹时聘等先后主持开泇河，到万历三十三年(1605年)泇运河全线通航。泇运河的开通，解决了因黄河泛滥影响漕运的难题。但是，从微山湖到台儿庄42公里的河道，西高东低，微山湖的湖底比台儿庄海拔最低处还高7米。巨大的落差，雨季储存在微山湖里的水源一泻百里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流泄净尽，将不能保证漕船的正常运行。为了解决水源下泄，保证此段运河水位正常，漕河官员采取建立闸坝以调节水位的办法。万历年间，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的河道上，自西向东依次建起韩庄、德胜、张庄、万年、丁庙、顿庄、侯迁、台儿庄八座斗门式船闸。各闸开挖越河一道，以备泄洪和蓄水，利于通航。为了减少启闭次数和闸门磨损，节省维修费用，每次过闸，船只必须结队编组，不准单船过闸。这样，船闸管理和维修需要专门机构。为此，朝廷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设闸官署4处，浅铺38处。每个闸官署设闸官一名，管辖两处船闸。

泇运河的通航，既避免了漕运风险，又缩短了航程时间，每年经此北上的漕船在7700艘以上，运送漕粮420万石。泇运河成为当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交通命脉。明朝河道总理于湛在《运河题铭》中说：“国家定鼎燕京，仰借东南朝税400万担，以资京师，为此漕渠一脉，为之咽喉。”足见台儿庄运河的历史地位和经济作用。

台儿庄虽然历史悠久，但是汉唐以来就是一个乡村集市，并无城垣，元代始才建有土坯。泇运河开通之后，随着漕运的兴盛，台儿庄也逐步繁荣起来，成为运河沿线的一座重镇。《峰县志》载：“自泇河既导，而东南财糈跨江绝淮，鳞次仰沫者，凡四百万有奇，于是遂为国家要害云。”明朝政府在台儿庄设置官衙，并开始筑城。到了清代，又进行过多次重修扩建。

清顺治四年(1647年)，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倡导重建台儿庄城，由县丞雷煊负责，次年竣工。主城南傍运河而建，东西长2.5公里，南北宽1.25公里，护城河宽10米，深2米，首尾与运河衔接。咸丰七年(1857年)，由地方团练长尤训光发起募捐，再次筑城。这一次修筑的城墙，城墙基为土台，墙高4米，上砌垛口，城墙从底沿而上，向内倾斜，砖墙内筑土胎，宽3米。建有城门6座：名字分别为仰生、台城旧志、中正、承恩湛露、惠迪吉、迎祥。东南西北四个正门均建有两层门楼，上为岗楼垛口，下为通道，城墙上面可行驶大车。城内修铺了12条街道和2公里的车大路，连接六座城门，城内有5000户人家，24300余人，房屋20000间。

由于运河漕运的发展，台儿庄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。江浙、湖广

一带的竹木、瓷器、丝绸、茶叶、蔗糖、稻米、纸张、桐油、工艺品、棉布、水果等，运抵台儿庄码头向周边批发；北方的山果、木材、药材、皮货、杂粮、油、麻、烟草、煤炭等也由台儿庄中转南下。很多商铺为了方便装卸货物，便在运河沿岸兴建了码头，有典当后码头、四十万码头、天后码头、阎家码头、彭家码头、高家码头、郁家码头、双巷码头、王公桥码头、骆家码头、谢家码头、霍家码头、王家码头等十余处。这些码头，满足了大量货物的及时装卸，为码头贸易提供了顺畅通道。在台儿庄古城内有的码头至今保存完好，成为京杭大运河沿岸仅存的明清码头。

台儿庄的兴盛，各地客商纷至沓来，投资兴业，台儿庄人口猛增。康乾盛世时期，台儿庄的加工业和商贸流通业繁盛一时，城内粮行、皮行、染坊、酒坊等大量涌现，手工业发达，行业众多，有数百种手工产品。在丁字街、月河街、顺河街、鱼市街、竹竿巷等商贸街巷，店铺多达百余户。明清两朝，台儿庄先后涌现出郁、台、花、马四大家族和燕、尤、赵、万四大商户，引领着台儿庄的商贸发展。河北、山西、宁夏、甘肃的一些回族居民也迁徙到台儿庄经商居住，经营独具特色的清真饮食，出现沙、洪、展、吕四大穆斯林商户，兴建了南北两座清真寺，汉回两族和睦相处，共同促进了台儿庄的繁荣。到清末民初，由于铁路运输的出现，运河漕运已没有往日的辉煌，但是台儿庄的商贸业仍然强劲。台儿庄为峰县40个集镇之首。当时的台儿庄商贾云集，店铺林立，街巷丝竹不绝，夜不罢市；河道上舟楫如梭，帆樯如林，渔火万盏，歌声十里，一派繁荣景象。《峰县志》说：“台庄濒运河，商贾辐辏，圜匱栉比，亦徐(州)兖(州)间一都会也。”

台儿庄地处我国南北过渡带，又是一座移民城市，运河漕运的发展，促进了南北文化在台儿庄的兼容并蓄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运河文化。如独特的服饰、饮食和婚丧嫁娶等民俗文化；富有鲜明特色、丰富多彩的民间曲艺和群娱群乐的民间游艺。大鼓、小鼓、渔鼓、快书、评书、琴书等曲艺品种门类繁多，狮子、龙灯、高跷、旱船、竹马、花鼓等民间游艺形式多样，反映了台儿庄文化多元、开放、包容的特点。

台儿庄文化的多样性是运河沿线最丰富的，所以它是运河文化最典型的代表。台儿庄沿河而建、因河而兴，繁荣的运河经济使台儿庄成了明清时期中国南北文化、南北建筑风格的结合点，这里云集了大批的晋商、徽商、浙商、闽商、粤商、是辐射苏鲁豫皖和沪浙闽等地区一座重要的商埠城市，其建筑风格具有“七分雄、三分秀”的特点，是南北交融、中西合璧的建筑结晶。古建筑门类繁多，主要有欧式建筑、广东建筑、福建建筑、徽派建筑、山陕建筑、江浙建筑、山东(北方)建筑等八大类建筑风格。古运河北岸的顺河街、越河街、丁字街等古街巷、古民居，顺河而建，布局灵巧，错落有致，古运河南岸的古村落，草屋茅舍，泥墙草顶，古朴清幽。

清朝的康熙、乾隆两位皇帝分别六次巡视江南，大多经过台儿庄。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，年近六十的康熙皇帝第六次南巡，驻驾台儿庄，做了两件青史留名的好事：一是召见告老还乡的官员曹自新，询问农事水情，拨款修筑堤坝。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》记载：“二月戊戌，次台庄，百姓来献食物。召耆老前，降询农事生计，良久乃发。”二是举办诗词大会，钦拔峰县文人李克敬为第一名。

台儿庄，这座大运河漂来的城市，有着繁荣富庶的荣耀，也有扬威不屈的悲壮。2008年，枣庄市委、市政府按照明清风貌重建台儿庄古城。一座二战纪念城市、东方古水城、全国首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、国家5A级旅游景区崛起在京杭大运河畔。



## 【史海钩沉】

## 齐鲁藏金

## □ 孙葆元

山东半岛是一个黄金的岛，这不仅是诗意的表达，更是因为山东半岛黄金产量高。宋朝人吴曾在《能改斋漫录》中写道，“登、莱州产金自太宗时已有之，然尚少。至皇祐中，始大发，民废农桑，采掘地采之有重二十余两为块者，取之不尽。”宋太宗年间始自977年，至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，已经有72年，在登州和莱州的土地上，当地农民放弃垦耕，大肆挖田掘地寻找金矿，最幸运的掘金者竟得到二十余两重的金块，足见金自天成。

金矿是极具诱惑力的，富矿的矿苗就裸露在地表，它又分布在地下各层，引诱着人们不断深挖，用大自然的魅力创造了人间神话。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宋仁宗之前的天圣年间(公元1023-1031年)，“登、莱采金岁盖数千两”。更早一点，景德年间，宋真宗就派重臣潘美来京东路督办招远玲珑山金矿的开采事务。朝廷对金矿的需求刺激了民间的掘金热，当时招远玲珑山有一千多个矿坑。

宋人朱彧在《萍州可谈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说莱州城东有一处刘姓茔地，才入葬十年，突然冒出了金苗，刘氏后裔日夜攫取却取之不尽。这件事被官府知道了，转由官府开采，搜刮完地表的矿苗，遂向地下开挖，谁知挖开墓穴，连券墓的砖都变成金色，一直挖掘下去，竟得金万亿计。官府抽市，刘氏家族分获十分之二三，即使这样仍富可连城，“京东诸郡之钱，尽券于刘氏”。这个故事自有其传奇色彩，但是也透露出两点信息：其一，金苗在地表是有迹可循的，发现了金苗就发现了金矿，刘氏家族的坟茔恰选在金脉上；其二，可以看出官府对于金矿的控制，并不是说刘家把坟茔建在金脉上，那座金矿就是他家的了。他只是误打误撞到财运，金矿仍然属于朝廷，只不过允许他抽成而已。尽管这样，刘氏仍是富甲一方。

这个故事说明京东路对于宋朝廷财政的巨大贡献，京东路的黄金冶炼出来运往京师。然而巨大的掘金开采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态，当宋仁宗欣喜若狂地嘉奖登、莱两州官员为朝廷作出的巨大贡献时，宰相王曾的头脑是清醒的，他指出：“采金既多，则农民皆废业而趋利，不当更诱之。”采金而废农，以此利废彼利，是有识之士言。宋仁宗在反复权衡中听取了这些意见，于明道二年(1033年)下令“禁登州民采金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13)。怎奈祸端已经埋下，到了1034年的景祐年间，登州、莱州发生灾荒，民不聊生，事情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宋仁宗为了救灾，取消禁令，复开金场。此后山东的金矿就这么开开禁禁，一会儿民营，一会儿“官确”，几经反复，最后确定了由民户开采，却严禁经营，官府在矿区设立监司，全部产品由官府“确实”的经营方针。应该说，这是一个既符合国家利益又照顾到生产者积极性的方针，到了元丰元年(1078年)登州岁收4700余两，莱州岁收4870余两，整个京东路岁收黄金万余两。

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识别了黄金，中国至迟在商代中期就已掌握了制造金器的技能，而且具有高超的制作金器的技能，金器比原金具有更高的附加值，到了宋代金银加工更是登峰造极。

北宋年间金属制造业的工场叫“作”，各行各业叫不同的“作”。如制造大型金属器具的叫“大炉作”，制作小型和民间金属器具的叫“小炉作”“金火作”。金器加工的“作”统一由文思院掌控，文思院里设立销金作、镂金作、镀金作、拍金作等，每一个“作”都具有独特的工艺，满足社会上层人物的消费。

南宋洪迈的《夷坚志》中有这样一个记载，宋徽宗得到一个西域进贡的琉璃瓶，爱不释手，整日置于案头玩赏。一天突发奇想，他认为，瓶色太单调，如果把金子铺进去将瓶变成一个金瓶该多好？于是命心腹太监抱着这个瓶到文思院去加工覆金，那些能工巧匠接过瓶子，左看了右看，没有一个人敢接这个活。那个瓶子的口太窄，肚子又大，怎么才能把金箔铺进去，而且要平整不露痕迹？何况这是圣上的爱物，万一在加工中稍有破损，那还不是掉头之罪！工匠们个个摇头。宋徽宗心愿未遂，提高了悬赏价码，还是没有人敢接这个活。他不死心，让太监寻访民间高手。这个太监抱着瓶来到大相国寺，这里聚集着北宋最著名的艺术家及各行各业的高手，当太监展示了这个瓶，一个金匠大胆地接受了这个挑战，几天后把一个金碧辉煌的内饰金瓶送到宫廷。宋徽宗吃惊不已，文思院的匠人尚不敢接的话，如何一个民间匠人能够做得这么好？就问，是怎样把金子铺进去的。那个工匠告诉他，先把黄金锤成极薄的金帛，测量好尺寸续到瓶内，然后注入水银反复滚动，水银很沉又是液体，随瓶铺展，那金帛就完好地铺进去了。

这个传说，说明了北宋金匠的高超技艺。

投稿邮箱：

qlwbrwq@163.com